

# OPERA AND

启微  
Jingren

## 文化中的政治

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

〔美〕郭安瑞 (Andrea S. Goldman) / 著

郭安瑞 朱星威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郭安瑞 (Andrea S. Goldman)

2005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专攻清代、民国文化社会史，包括都市文化、戏曲表演及社会性别研究。本书英文版曾获得 2014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图书奖 (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目前的研究课题是清末民初在全球化影响下中国戏坛的男性再塑及其文化含义。





朱星威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硕士，现任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兴趣包括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戏剧、电影与娱乐文化。











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

文化中的政治  
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美〕  
郭安瑞  
／  
著

郭安瑞 朱星威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通过探研伶人、观众、剧作家及清廷之间的种种关联与碰击，揭开了十八、十九世纪北京商业戏园的面幕……（该著）研讨深入，文笔精妙，分析入微，本身就是一场风骚独领的表演大戏。

——摘自美国亚洲研究协会 2014 年列文森图书奖颁奖词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启微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1680-0



9 787520 116800 >

定价：69.00 元







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 by  
Andrea Goldman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2012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http://www.sup.org).



# OPERA AND

## 文化中的政治 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

〔美〕郭安瑞 (Andrea S. Goldman) / 著

郭安瑞 朱星威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剧种的更迭，三是一些典型作品的舞台呈现。三个方面的探讨都很深入，触及了北京戏曲史以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系列深层问题。

对于清代文人留下的一系列“花谱”，中国学者似乎不大看得上，这首先是因为谱中罗列评品的“花”主要是男旦，与当年评品妓女的文字性质相似，戏曲史研究者对花谱的利用主要是从中“抠”一点演剧史料。安瑞教授却认为花谱中“不仅记载了伶人戏里戏外的故事，还揭示了戏迷作者自己的特征，从而为解读帝国晚期的中层文人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扇“窗户”被安瑞教授打开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既有艺人（尤其男旦）的演艺和生活状态，也有文人作者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对该类文字的人文内涵和价值另眼相看。对花谱的重视与否，应该说体现了研究者眼光的差别。

该时期北京的戏曲表演场合有戏园（茶园）、庙会、堂会（包括宫廷）等，此书对它们的考察也很周详，尤其对戏园演剧情况的讨论很深入。戏园不只是一种观赏演艺的场所，更是一种由无数心智能量复杂交汇而成的独特空间。看客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有汉族有满族，有精英有平民，有戏迷有外行，此外还会有政府监管者，后来还有了女性……他们自然各有期待和欲求，对作品各有评价尺度。场上之戏首先要对尽可能多的看客有吸引力，让他们满意，同时创作者也会或显或隐地表达某些意识，因而作品中既会体现“正统”，也会包含种种“越界”乃至“挑战”。显然置身于多种不同的欲求和理念交集混杂的场域，戏曲的“多棱镜”必然折射出复杂多样的心理趋向和文化内涵。就我的有限了解而言，中国学者对戏园文化心理的讨论大都显得笼统。安瑞教授则通过细致考察观众



的构成、不同类型观众的观演行为、所演之戏的内容处理、朝廷的监管举措等种种事项，对戏园观演情形的剖析相当透彻。

戏曲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不可避免会引起宫廷的注意，宫廷还会把对戏曲的管控当作体现其威权的一种方式。在戏曲种类问题上，清宫本来推举“雅正”的昆腔、弋腔，还曾驱逐“淫靡”的梆子腔等，但19世纪后期开始又转而青睐皮黄（皮黄和梆子都属于花部乱弹），最终促成了昆剧在剧坛上的盟主地位被皮黄取代。自从近百年前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提出“乾隆末期以后之演剧史，实花雅两部兴亡之历史”的观点，其后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把“花雅之争”当成清代中后期戏曲史的“主线”。但昆剧之“雅”呈现在舞台上究竟是什么样子，似乎并未引起认真的关注，不少人理解的“雅”大体还是明清文人传奇的那种典雅、精致和“书卷气”。但事实上文人传奇的“雅”在清中叶后的北京市场上已无法立足。此书则对这一时期北京舞台上的昆剧作了认真探讨，将其定性为“一种混合性的商业性昆剧”（或“杂糅的商业昆剧”），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中还细致解析了该类昆剧的若干部作品（下面再说）。与此相应，《文化中的政治》把昆剧在北京“衰落”的时间推到了19世纪后期。书中直言：“中国学术界认为皮黄的出现是雅部和花部之间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的结果，称为‘花雅之争’。这一研究方法将昆剧消亡的时间提前，忽视了在19世纪初杂糅的商业昆剧的重要意义。”这些看法与中国学者的流行认识出入较大，很值得注意。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第四、五章）是以《翡翠园》《水浒传》《义侠记》《翠屏山》几部戏为例，具体分析昆剧在当时



舞台上的真实状况。这一部分的内容显示了作者在作品审视方面的眼光和认识深度，读来十分生动。

同一部戏在不同情况下被“改来改去”——艺人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对旧有之戏作不同幅度的改造——是民间戏曲的典型做法，一部戏常会因此而衍生出很多“变体”。梆子、皮黄之类对旧有之戏“改来改去”不会让我们意外，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乱弹”（这顶帽子本来是文人“赠给”注重自由创造的民间戏曲的）。但一直被认为是“高雅”和注重“规范”的昆剧也会对既有作品“改来改去”，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

中国的学者已有人注意昆剧艺人“擅改”文人传奇的做法，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曾举出一系列昆剧折子戏的实例，将它们逐一与传奇原作对照，表明昆剧艺人对传奇原作“率多改节”已是司空见惯。<sup>①</sup>《文化中的政治》的做法则更彻底：《翡翠园》《水浒传》《义侠记》《翠屏山》四部戏都分别列出了几种形式的演出本——包括折子戏和“节本”（名为“全本”，实为节选），一方面对比它们与传奇原作有哪些不同，一方面分析每一种具体演出方式（例如不同的折子是组合演出还是独立演出等）会有什么样的观演效果。例如《水浒传》《义侠记》《翠屏山》三部传奇中的女性人物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都因婚姻出轨而最后被杀，全剧由此体现出明确的道德警示意义；但从三部传奇中节取加工而成的若干折子戏却将三人的越轨作为表演重点，于是实际演出的效果便与原作的意蕴大相径庭了：三个“淫妇”都机灵、浪漫、性感，她们的调情行为成为戏里最耀眼的亮点，甚至她们被杀也多少

---

<sup>①</sup>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第178～185页。



让人同情，传奇原作中的道德警示内涵则消失殆尽。《文化中的政治》由此得出的认识是：同一部戏可以因不同的节取和演出方式而“传达不同的社会含义”。书中也指出：该类折子戏都已因其通俗流行而不被看作高雅艺术，而且都被列入了19世纪中期私人或官修的“淫戏”名单，遭到禁止。这一系列实例确切无疑地表明《文化中的政治》提出的“商业性昆剧”概念以及对其雅、俗定性的辨析，都相当透辟。就我的狭窄阅读范围而言，还不曾见到哪一位研究者把昆剧此类剧目的改编和演出方式分析得如此彻底，并从中解读出如此重要的信息——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对该类昆剧的认识（定性）是否恰切，关系到我们对清中叶后北京剧坛演化走势的把握是否准确。

《文化中的政治》对《水浒传》等戏的实际演出效果的分析，让我联想到昆剧的另一个近似之例：我听过不止一位人士称赞《长生殿》“好就好在把李隆基、杨玉环塑造成了才子佳人”，然而在完整阅读《长生殿》原作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读出洪昇要把李、杨写成才子佳人（即否认他们对那场“安史之乱”的责任）的意思，因此我寻思“塑造成了才子佳人”的印象很可能是从《长生殿》的那几个常演的折子戏得来的——《密誓》《惊变》《埋玉》《闻铃》《哭像》几个折子都是重点表现两人的恋情（演员当然会尽力表现两个人的“情真”）。如果我的这个猜想大致不错，《长生殿》折子戏的这种观演效果，是否可以成为《文化中的政治》上述分析的一个“辅助例证”呢？当然《长生殿》与《水浒传》（包括它们的折子戏）完全不是同一档次的作品，但脱离传奇全本（原本）的折子戏演出，可以给观众带来不同于全本演出的欣赏感受，



这种现象应该具有普遍性，而这一点首先是由《文化中的政治》揭示出来的。

此书还接着讨论了昆剧的“改来改去”做法延伸到乱弹和宫廷大戏的情况。《水浒传》等戏都被进一步改造成乱弹（皮黄等），调情、奸情未被删除，但“恢复了从女性出轨到男性报复的完整叙事”，“而（男性报复的）暴力也被看作是和浪漫调情一样饶有趣味”。这种改造更多适应了平民观众的口味。宫廷大戏《忠义璇图》也把《水浒传》等戏的基本情节吸纳进去，只是从皇权立场出发，改编方式又很不一样：三位女性越轨的情节在戏里的地位大大下降，她们被杀也完全是“罪有应得”，但全剧终结时，曾经仗义杀死“淫妇”的梁山好汉都下了地狱。

以上只是我粗读此书后的一点简单印象，但可以看出安瑞教授对戏曲与帝都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探讨已相当深入。戏曲的门道本来很深，又是清代的戏曲，而且重点是当时戏曲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联，这样的题目中国学者做起来都会很吃力，更不要说是由西方学者做了。安瑞教授在这本书的“中文版自序”里只讲了她如何喜欢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戏曲，而没讲她为眼前这个孕育十年才呱呱坠地的“女儿”付出了多少辛劳，这显然是把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讲得太简短太轻松了。我也不能在这里把故事讲得太长，只举两个小例子吧。

例之一：一次安瑞教授和我在北京坐出租车，下车时司机扭过头来才发现她不是中国人，他大感惊讶：“您在后排座说话，我根本没听出您是外国人。”

例之二：20 世纪末某一段时间安瑞（那时她还不是教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查阅旧时艺人的抄本，因



那些抄本不让复制，她便一本一本地抄，结果不久以后，抄本上好些我不认识的“异体字”她都认识了。

这两件小事可以说明她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掌握到了何种水准。读这部《文化中的政治》也很容易看到，安瑞教授对戏曲的“底层材料”（包括艺人抄本之类）掌握得很好。有了这样的基础，她才能在别人（包括中国学者）不曾看出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这个题目才能做到不逊于中国一流学者的水平。

安瑞教授又毕竟是西方学者，因此她能大量结合西方艺术、学术和文化的成果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并常常眼光独具。因而尽管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这部著作仍然体现了西方学者的很多优点，例如视野广阔，思考严密，重视掌握“底层材料”和注重实证等。中国不少学者还是很重视向西方学者学习的，例如常能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要借鉴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只是我们很容易认为“方法”就是方便、省事之法，就像拿到了一个公式，就可以套用于所有同类的数学题，从而轻松得出答案。然而在阅读了安瑞教授的著作后，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西方的研究方法都是方便、省事之法。记得安瑞在北京查找艺人抄本的那段时间，我看她工作太辛苦，便“建议”说那些“例子”少一个两个也关系不大吧，她却告诉我按照美国的学术要求，样本少了是不行的。现在读了《文化中的政治》的第四、五章之后，我也才意识到按照美国的学术要求，那些同一部戏的不同演出版本哪里只是一些“例子”呢！要说安瑞教授研究这一课题的“方法”，恐怕首先还是埋头苦干之法，同时要坚持不打折扣的质量标准，还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定力，这些才应该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